

人口出生率与自然、社会的 不适应和社会强制

李建德

一 人口出生率的适应与不适应

(一) 人口出生率的适应。从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看,一定的人口出生率是人与自然环境、社会环境适应的结果。

例如,在非洲赤道地区的社会中严格实行着产后性禁忌,在婴儿两岁左右可能断奶之前,禁止其母亲发生性行为。这种习俗扩大了生育的间隔,从而降低了人口出生率。产后性禁忌的实施是带强制性的,在当代人看来甚至是极不人道的。但是,这一地区的食品中缺乏蛋白质。如果没有这种禁忌,一位母亲很快又生了孩子,她就不可能再给较大的孩子哺乳。结果,没有了母乳,婴儿就失去了蛋白质食物源,就易患一种被称之为夸希奥科(Kwashiorkor)的病。因此,产生性禁忌就起到了保护婴儿生存机会的作用。由此形成的低人口出生率,使整个部落能在特定的自然环境、社会环境下得到生存和发展;是这一部落对自然和社会环境适应的

结果。

就中国而言,公元前2205年的夏禹时期,人口估计为1335万。至公元2年西汉时增加到5956万,其间2207年的人口增长年率为0.68%。经过多次大起大落,到公元1290年元代时人口为5884万,这1288年间的平均增长率几乎为零。从1290年后,人口比较稳定地上升,到1912年人口也仅增至40581万人,年增长率为3.11%。中国人口增长总趋势的平稳,是高人口出生率与频繁的自然灾害、饥荒、疾病和战争所造成的高死亡率适应的结果。

再以欧洲为例,200多年间这一资本主义发展中心的口增长率经过一个上升期后,也逐渐趋于稳定(见表1)。

为了解欧洲人口增长率趋于稳定的机制,我们以德国(1980年是联邦德国)为例,分析出生率和死亡率的变化(见表2)。

在1900年以前,德国人口死亡率的下降快于出

生率的下降,但从1900年以后,死亡率的下降开始慢于出生率的下降,并使人口自然增长率逐步降低,甚至出现了负增长。这种变化,在各市场经济工业国中是普遍的。这些国家人口增长率能趋于稳定,都是由人口出生率的下降快于人口死亡率的下降而实现的。如果把死亡率的变化看作是社会经济过程,那么生育意愿作为文化过程就要有能力实现更快的转变,这样才能达到新的适应。

表1 欧洲人口增长的变化过程

年代	1750~1800	1800~1850	1850~1900	1900~1950	1950~1970	1970~1978
平均人口 增长率%	4	6	8	6	11	8

资料来源:马全平、黄裕冲编《中国昨天与今天1840~1978国情手册》,1989年版1.2页。
《世界人口与经济》(统计汇编)第13页。

表2 德国人口增长的变化过程

年份	1841年	1900年	1939年	1980年
出生率%	36.4	35.6	20.4	10.1
死亡率%	26.2	22.1	12.3	11.6
自然增长率%	10.2	13.5	8.1	-1.5

资料来源: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苏联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历史统计集(1800~1982年)》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596、627页。

(二) 出生率在社会环境变化时的不适应。在自然和社会环境发生变化时, 原有的人口出生率的适应可能被打破。例如巴西中部的塔皮拉佩 (Tapira'pe) 人, 在与自然环境缺乏蛋白质食品的适应中, 形成了崇尚小家庭的习俗。他们不仅认为妇女不应该生育三个以上的孩子, 而且还采取强制措施来实现这种限制。如果说, 这种包含了强制的低人口出生率和低人口自然增长率是原先适应的结果, 那么当欧洲人进入该部族周围地区后, 就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人口的迁移和死亡率的上升, 已使人口锐减。但他们没有能够适时改变他们限制人口的习俗。其结果, 该部族人口已从一千多人降到了不到一百人, 已到灭绝的边缘。人口出生率从原有的适应转化成了不适应。

人口出生率在社会发展中出现的不适应, 在现代也是广泛存在的。从200年来世界及主要后发展地区人口增长率的变化中可以了解到, 本世纪50年代起, 亚、非、拉地区都出现了20%以上的人口年增长率。为了剖析高人口增长率的形成机制, 这里列举三个国家为例, 看看人口出生率的不适应 (见表3)。

表3 三个国家人口发展状况的变化

国家	年 份	1945年	1950年	1960年	1970年	1975年
埃及	出生率 (‰)	42.7	41.8	43.0	34.9	35.5
	死亡率 (‰)	27.7	19.1	/	15.0	12.4
	自然增长率 (‰)	15.0	22.7	/	19.9	23.1
斯里兰卡	出生率 (‰)	36.7	40.4	/	29.4	29.5
	死亡率 (‰)	22.0	12.4	8.6	7.5	7.7
	自然增长率 (‰)	14.7	28.0	/	21.9	21.8
哥伦比亚	出生率 (‰)	31.9	36.7	41—44	44.6	40.6
	死亡率 (‰)	15.8	14.2	12—14	10.6	8.8
	自然增长率 (‰)	16.1	22.5	29—32	34.0	31.8

资料来源: 根据《世界人口与经济的发展统计汇编》第81~83页, 第92~94页整理。

这三个国家人口死亡率在统计期内都趋稳定下降。人口出生率的变化情况则各不相同。埃及的人口出生率在波动中趋向于下降。斯里兰卡和哥伦比亚则显示出先升后降的趋势。斯里兰卡的拐点在1950年前后, 而哥伦比亚则在1970年前后。但是, 不论哪一个国家, 人口出生率的下降都大大落后于人口死亡率的下降, 这就导致了不适应的高人口增长率。在后发展中国家里, 人口死亡率大幅度下降是社会经济发展的标志之一。人口出生率却没有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作出足够的调整。人口增长率的快速上升, 并且持高不下, 反过来又使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协调、自然环境与人类生存发展之间的不协调进一步恶化。

这里要指出的是, 即使是发达国家在其发展的历程中, 也存在过人口出生率的变化滞后于人口死亡率变化, 并且出现过人口增长率上升的时期, 只是上升的年率不是那么高而已。即使如此, 对应于人口增长率的上升, 这些国家的社会结构仍然是不能适应的, 并直接表现为该历史时期中欧洲人口向南北美洲、南部非洲和大洋洲空前绝后的大规模移民。因此, 先发展的资本主义国家中人口出生率不适应的社会恶果, 是经过输出而由殖民地居民被迫吞食了。发达国家人口出生率的自适应过程, 也是滞后了200年之久, 直至上世纪末、本世纪初才得以形成的。

二 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不协调是当代人口出生率不适应的原因

当代发展中国家人口出生率的不适应, 是现代化进程中的必然现象。不同的现代化模式会使人口出生率的不适应具有不同的特点。发达国家是内生

的现代化 (Modernization from within), 是在社会、经济和文化大体同步的演变中完成的。而发展中国家在实现现代化时的条件已经完全不同, 往往是一种外诱的现代化 (Modernization from without)。现代化要素在发展中国家里, 尤其在启动阶段, 不能不采取引入的形式。在经

济领域中现代产业的引入与原有的传统产业共存, 形成了另一种形式的二元经济结构。在社会领域, 现代社会目标的引入与仍然落后的经济和文化状况形成了社会与经济的错位。在决定人口自然增长率的二个要素的关系上, 则具体表现为人口出生率变化与人口死亡率变化的错位。保障公民生存和健康的社会目标, 被较快地引入了发展中国家的政府行为。现代的防病、治病的手段也较快地进入了发展中国家等等, 这些都使发展中国家人口死亡率比发达

国家迅速下降。比如,法国的人口死亡率从1901年的20.1%下降到1982年的10.3%,用了80年。日本则用了82年(1894年的20.1%到1976年的10.0%)。而发展中国家完成同样的下降,斯里兰卡不到10年(1945年22.0%,1955年10.8%),智利也只是20年(1945年的20.0%,1970年的8.5%)^①。但是,改变相应人口生育意愿所必要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前提,却远没有同步完成。人口出生率变化的严重滞后及不适应,是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总体不协调的重要表现之一。

发展中国家内部发展的不协调,不过是世界发展二极分化或称为南北差距扩大在这些国家内部的表现,是国际资本主义经济社会秩序长期运行的严重恶果。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长期不对称的资本转移、商品交易、技术往来和人口流动,导致了世界发展的鸿沟日益加深,发达和不发达的差距扩大,并导致了发展中国家内部的社会、经济和文化之间的不协调。

既然发展中国家人口出生率的不适应是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不协调的表现,那么人口出生率在这些国家内部表现出较大的差异,也就不奇怪了。在一个地区中,社会、经济和文化实现协调发展的能力及其程度,从根本上决定了该地区人口出生率适应、不适应及其程度。比如,在中国的城市中现代化进程不仅较早发生,而且在演进中也比较协调,低出生率生育文化也较早形成,因此,城市人口出生率一般低于农村。不同阶层、不同社会群体在现代化过程中具有不同的适应能力,这从根本上决定了该群体人口出生率的适应、不适应及其程度。比如在中国,初中以上甚至更高文化的社会群体具有较强的适应性,有能力协调包括出生率在内的自身要素,以适应自然、社会环境的变化,因而他们与低文化社会群体相比一般具有较低的生育率。

但是,如果在理论上过于简单地把以上现象概括为城市人口或高文化人口的出生率低,却是不完全正确的。因为适应自然、社会环境的既可以是低出生率,也可能是高出生率。不仅仅是工业化才涌现出大量城市,前工业社会同样有城市。后一类城市人口的生育模式显然不会与现代城市人口相同。而且在历史上城市人口的生育行为也并不是单一的。只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后工业化过程中,现代城市居民的生育行为才逐步被整合成单一的模

式。此外,在战争之后人口补偿时期的适应,也需要高出生率,此时适应性强的城市人口就可能会有较高的人口出生率。诸如此类等等。统计资料也显示了城市人口出生率的复杂性。比如中国1963年以前的人口出生率总体上就是城市高于农村。又比如,统计资料显示收入水平与出生率的相关关系并不显著。但人口出生率的适应理论仍然可以作为对这一社会现象进行分析的理论框架。高收入既可能出现在社会、经济和文化协调发展的地区,也可能出现在发展不够协调的地区;高收入者既可能是现代化的劳动者,也可能是现代意识并不充分的市场经济弄潮儿。他们在生育行为上的差异是可以得到各自解释的。

当然,人口出生率的适应理论只是一个基本理论框架,它并不排斥对任何一个社会群体的人口出生率作具体的实证研究。

三 人口出生率的不适应与社会强制

发展中国家要重新形成人口出生率与自然、社会的协调,已经不可能以转移恶果的方式来度过过渡时期。对社会主义国家更是不允许这样做。因此,只有依靠自我,实现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协调发展,消除不发达现象。比如,有赖于全民族经济和文化水平的提高,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农村基层政权和法制的健全等等。但是,这要经过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过程才能完成。在这个过程中,人口高出生率的惯性不仅在继续产生着过高的人口增长率,而且可能还没有完成这个转换,人口已经超过自然环境可承纳的限度,形成不可逆的恶果。因此,为了把中国的人口出生率控制在社会可忍受的范围内,采取一定的社会强制措施是十分必要的。

社会强制包括法律强制、行政强制和文化强制。前二者是大家熟知的,而文化是限制个人行为变异的另一个主要因素,往往不被人们注意。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埃米尔·杜尔干(Emile Durkheim)认为:文化是我们身外的东西——它存在个体

^① 有关数据引自《苏联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历史统计集》第421、422、688、689页和《世界人口与经济(统计汇编)》第92、94页。有些不发达国家实现死亡率低于10%的绝对年代竟比发达国家更早,这似乎是反常的。这可能与这些国家第一代疾病已得到有效治理,而第二代疾病还不曾兴起有关。

之外,而又对个人施加强大的强制力量。我们并不老是感到文化强制的力量,这是因为我们通常总是与文化所要求的行为和思想模式保持着一致。然而,当我们真的试图反抗文化强制时,它的力量就会明显地体现出来。文化强制有两种基本类型:直接文化强制与间接文化强制。直接文化强制比较明显。比如,在“多子多福”的社会环境中,只生育一个孩子,尤其是只有一个女孩的妇女就会遭到嘲笑,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会遭到社会的孤立;如果根本没有生育,则将会受到更直接的社会强制——她将在婚娶上被遗弃。虽然间接文化强制不明显,但其效用却与直接文化强制不相上下。正如杜尔干所说:“没有谁强迫我非得同本国人说法语,或非使用合法货币不可,但我却不可能有其它的选择。如果我试图摆脱这种必然性的话,那只会以悲惨的失败而告终。”^①

包括了文化强制在内的社会强制,是任何社会在任何时候都不可没有的。本文已在诸多例举中提到。不论是高出生率习俗还是低出生率习俗,在多数人出于自愿的同时,总有少部分是受制于社会强制。即使在人口出生率是适应的情况下,社会强制也是存在的。人口出生率与社会的不适应,作为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不协调的结果,显然已不可能仅仅采取文化强制就能改变的。在特定历史时期中,社会强制是必要的,这主要是指行政强制和法律强制。因此,如果一方面主张实行计划生育,另一方面又试图在计划生育工作中完全避免行政强制和法律强制,实在是缘木求鱼。当然,对于社会主义的中国来说,“强制”也应当是有限度的,不可用其极,否则又会导致其它方面的不适应、不协调,这正是政府长期以来所强调的。顾此失彼,难免在政策上流于形而上学。

社会强制从来只能是针对社会上少数行为变异者实施的。人类和民族的长期和总体利益,高于部分人的局部和眼前利益。这本身就是人道主义。中国为了尽早实现人口出生率与自然和社会的适应所采取的必要的社会强制,不仅是全民族长期稳定协调发展所必要的,也是中华民族对人类所作的伟大贡献。

四 社会强制在形式和内容上的完善

在明确社会强制的必要性时,我们必须强调法律强制和行政强制在形式和内容上的不断完善,强调赋予社会强制以理性的意义,并随着社会经济

协调发展的实现,尽早使社会强制基本上局限在文化强制的范围内。为此,当前要着重解决以下问题:

(一) 社会强制所调整的行为内容必须有充分的科学依据,既要使社会强制降低到无可替代的最低程度,又能使出生率处于恰当的适应水平。民族或人类总体利益的重要性和社会强制的必要性,并不意味着可以毫不顾个人利益,更并不意味着允许强制的滥用。我们需要的是整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的满意结合。这首先需要人口决策的正确。强制所依据的宏观决策如果失误,不仅将直接产生重要的宏观后果,而且还会引发与社会成员个人利益的过度冲突。因此,社会强制所依据的人口政策必须力求科学。宏观人口决策关键在于确定基本参数。降低人口出生率可利用的参数并不是只有一个生育胎数,提高初育年龄、扩大生育间隔,都可以降低人口出生率。多参数决策拥有较多的选择空间,既可以减少社会强制的作用范围,也更容易找到民族整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结合的满意点。比如,对政策允许有计划生育的二胎,不仅作出已生育子女性别和家庭状况的界定,还作出初育年龄和再生育间隔的界定,就能比较普遍地使农村初育年龄自愿推迟。

(二) 社会强制的具体运行,本身要与经济社会发展相协调。人口出生率与社会的适应,归根结蒂依赖于实现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协调发展。社会强制仅仅是在过渡时期中才是必要的,而且也是为了缩短这个过渡时期。因此,在实施任何社会强制手段时,即使不能促进至少也不应当妨碍、阻滞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协调发展。这应当成为健全和完善社会强制时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

在社会发展中,人口的合理流动是一种进步。但是为逃避行政强制的少数人,也采取了“超生游击队”的形式。对“超生游击队”应当强化行政管理,甚至需要法律的手段,使其纳入计划生育的轨道。但是,在个别地方为了防范“超生游击队”的出现,把一切人口流动,包括合理的人口流动也管死了,因噎废食,最终也不利于人口出生率与社会适应的尽快形成。这是应当而且也是可以避免的。

人口出生率与社会的适应,相当重要的是形成

^① 转引自(美)C·恩伯、M·恩伯:《文化的变异——现代文化人类学通论》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7页。

有利于低人口出生率的文化强制。行政强制和法律强制应当有利于低人口出生率文化强制的形成。但是农村在实行计划生育时,行政控制的行为目标单纯地着眼于生育胎数,反而强化了生育男孩的妇女无上光荣的文化势态,形成了一定要生男孩的文化强制。这是行政强制与由此而来的文化强制彼此相悖的典型事例。因此如何确定农村计划生育的参数控制方式,以及如何建设和利用农村文化环境,使那些不得不采取的行政或法律的强制能和走向未来的文化强制协调一致,是当前亟待解决的课题。如果恰当地利用二元经济中农村居民向往城市的基本心态,设计一项政策,使那些初育年龄超过一定标准而又只生了一个女孩的农户,当达到基本教育水准后能享有“农转非”的待遇,这可能是在农村中形成低人口出生率并提高女性文化水准的巨大文化强制的最有效手段之一。

(三)社会强制必须规范化、制度化,并且要对行政强制、法律强制本身实行监督。规范化和制度化是赋予社会强制以理性的重要方面。有关法规的制订要理直气壮,丝毫不必讳言计划生育工作中所必须的社会强制。有关计划生育的法律应当由中央政府提出,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有关行政

法规,必须明确至操作层次,尽可能由省一级政府提出,由省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县及县以下政府在计划生育工作中实际上是执法部门。如果把立法职能向下转移,既混淆了立法和执法的不同职能,也容易造成不规范的社会强制。只有当涉及到不同区域文化和经济特点的某些具体条款,才能交由较下级的政府因地制宜地把握。但是也仍然要由地方政府提出,由地方人大通过明确的行政法规,使一切行政强制和法律强制的具体操作,都有章可依。计划生育部门应当直接拥有对计划生育法规的督查和执法权,如同税收部门、物价管理部门一样。如果计划生育部门只是提出奖惩办法,另有司法部门去执行,这将会导致行政强制在运行中的割裂,并导致严重失效。对各级执法部门必须加强监督,要实行廉政和勤政。行政诉讼法的执行,在中央和省充分承担起立法职能后,不应当成为计划生育工作的障碍。相反,这是使计划生育工作规范化、法制化,从而使计划生育工作中所必要的社会强制能有效运行的充分保证。

(本文责任编辑 汪正鸣)

(作者工作单位:江西省社科院经济研究所)

(上接第64页)

同。大陆自1988年实行90天全薪产假,产假时间相对较长;香港实行6个星期及2/3薪产假,产假时间相对较短。北京、广州、香港在业女性仍愿采用现时这种产假安排的有42.5%、27.2%和49.2%。此外,对于停职、部分支薪、三年内由妇女自由决定复工时间的产假安排,北京、广州、香港各有38.9%、47.9%、16.3%的人赞成,这种方式较受大陆,特别是广州在业女性的欢迎(见表9)。

在问卷最后一部分涉及女性自身权益方面的问题,三地女性最不能接受的是“女性因生育而被列入富余人员行列是应该的”这一说法。女性因承担人口再生产和行使做母亲的权利而被拒于就业之外,引起女性强烈的反感和不安,并要求保护这方面的权益。

北京、广州大多数女性还期待改变传统用工形式,采用灵活多样的适合女性就业特点的工时制度和就业形式,如半月工、小时工、计时工、临时工、外发工、半工半休弹性工等,以提高劳动生

产率的前提下,满足女性的多种需要。并建立健全人才交流市场,使单纯指令性计划体制下的刚性就业制度向有计划商品经济体制下的弹性就业制度转变,为女性提供更大的选择空间和更多的就业机会。香港女性则希望政府在讨论本港福利政策时,增加有关为妇女服务的法例。

在调查中,通过走访、座谈,三地女性对自身也提出了期望和要求。北京、广州女性认为,对女性进行自强不息的教育是十分必要的。一方面要抛弃男尊女卑的传统观念;另一方面也要改变对国家的种种依赖,和依仗女性的特殊性心安理得接受照顾、不求奋进的心态,树立起自强不息的现代女性形象。三地女性共同认为,女性的自我意识、自我觉醒程度是妇女解放的重要条件。

以上四个方面仅是女性就业研究的开始,愿人们更多关注它,探讨出更多的女性就业问题以便充分发挥女性创造力。

(本文责任编辑 张京华)

(作者工作单位:北京市妇女联合会)